

翻译生态学断想

——翻译研究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沃土

许建忠

(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市, 300191)

摘要: 世间万物的诞生、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其生态环境, 而生态环境是有机体生存空间内各种条件的总和。既然翻译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活动, 那它的诞生、生存和发展就离不开人类生态环境。翻译研究也是如此, 它有着自己赖以生存的沃土。人类生态环境是一个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在内的复合生态系统。按照生态学原理, 全球生态圈和地域生态圈是相互依存的, 全球生态圈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地域生态圈的消失, 相反, 正是这五彩斑斓的地域生态圈构成了大一统的全球生态圈。那么翻译研究只有扎根于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壤, 才能保持特色, 并使其小生态圈得以保留, 从而为建设外部大一统而其内部又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全球生态圈做出贡献。中国的翻译研究也不例外。

关键词: 翻译研究; 生态环境; 地域性; 翻译生态
中图分类号: H059

按照生态学原理, 全球生态圈和地域生态圈是相互依存的, 全球生态圈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地域生态圈的消失, 相反, 正是这五彩斑斓的地域生态圈构成了大一统的全球生态圈。那么翻译研究只有扎根于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壤, 才能保持特色, 并使其小生态圈得以保留从而为建设外部大一统而其内部又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全球生态圈做出贡献。中国的翻译研究也不例外。

世间万物的诞生、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其生态环境, 而生态环境是有机体生存空间内各种条件的总和。既然翻译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活动, 那它的诞生、生存和发展就离不开人类生态环境, 翻译研究也是如此。人类生态环境是一个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在内的复合生态系统。翻译研究赖以生存的沃土, 有大小之分, 大的指全球, 小的指地域, 因此本文就将谈论话题具体到地域(包括涉及的领域), 以便集中论证。

1. 翻译研究的地域性

以色列特拉维夫学派的著名学者 Evan-Zohar 提出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认为, 从文学史上看, 翻译文学既占据过“主要地位”, 也占据过“次要地位”, 一个民族的文学地位决定了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的地位, 或起主要作用, 或起次要作用。而翻译文学的不同文化地位反过来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译者的翻译决策。根据多元系统论, 如果一文学多元系统十分强大, 从而使翻译文学处于一个次要地位, 以这一多元系统为目标系统的译者往往会采取归化式的翻译方法(domestication); 而如果翻译文学在某一文学多元系统处于次要地位, 译者则多采取异化式翻译方法(foreignization)。这种涉及主流翻译策略取向在世界一些地区, 尤其是以色列, 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以色列是个新兴国家, 其国民同外国文化的联系又是那么密切, 年轻一代的以色列人对自己的文化很难有认同感, 他们不得不通过

翻译向更为强大的文化学习，通过翻译不仅向以色列年轻的文化引入新思想，而且也引入形形色色的形式和体裁。因此，其翻译策略采用的是异化法。但用多元系统论的这一论断来解释中国的翻译现象就会出现一些不同步现象。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出现过四次翻译高潮，其中除第二次高潮以引进西方的科技为主外，其它三次都主要为文学翻译。第一次翻译高潮（146-1111）中，佛经翻译的由始到盛，正是中国文化逐渐强大至鼎盛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的翻译也经历了由异化到归化的历程，这与多元系统论的论断是相吻合的。第三次翻译高潮时期（1840-1930s），尽管中国当时的文化地位在客观上是处于劣势，但长期以来，国人无不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是理所当然的世界文化中心，中央大国、文化霸主的意识在当时根深蒂固。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体验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滋味，决意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之道，但仍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愿面对已经落后的文化地位，极力维护封建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调”。于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同一文化背景下，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策略取向，即翻译策略是异化和归化共存。第四次翻译高潮始于文革结束后，情况同第三次高潮大致相当。后两次高潮所出现的异化归化翻译策略并存的现象是多元系统论无法解释的。

显然，由于多元系统论未考虑译者的文化态度，即只考虑了制约翻译策略选择的客观文化因素，而忽略了作为翻译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得其无法解释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些情况。其实，多元系统假设的始作俑者 Evan-Zohar 的理论局限是与生俱来的，他的理论视野主要局限在他所关心的文化体系（即有其地域性），中国文化显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可以说，多元系统论对文学外的特别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因素，是故意忽视的。Toury 曾说过，文学翻译是个方便的批评讨论题目，部分原因是“它避开了任何有关国歌或《圣经》翻译的讨论必然要涉及到的许多意识形态方面的忌讳”（Toury 1995: 169-170）。Feldman 曾有如下揣测：“我觉得，他们是害怕以色列的现实中无处不在、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所以才感到科学这个比喻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理性和客观的错觉，无疑一道极其需要的屏障，用来挡开以色列动荡不安的现实生活”（Feldman 1985:34）。

尽管多元系统论受到很多批评，但从翻译生态学角度讲，一理论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不可能穷尽世间所有翻译问题，只要其没有离开其赖以生存的沃土，符合其地域性，也就算是个有用的理论了，因为它毕竟冲破了传统翻译理论注重静态的语义对比研究，往往把语言模式或不太发达的文学理论作为研究基点的牢笼，扩展了翻译研究的理论疆界，将翻译文学嵌入了一个更为广大的文化领域，为翻译研究最终走出规定美学 (prescriptive aesthetics) 的局限开辟了道路（Gentzler 1993:125）。

近几十年来，等效原则在世界各地引起很大反响。这个原则最早是由 E.V. Rieu 在 1953 年提出的；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Eugene A. Nida 在他的许多专著和论文里，以这个原则为基础，发展出了一套动态（或称功能）对等的理论，并且提出了若干如何在翻译中达到和检测动态对等的方法。他认为，“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Nida 1964:159），或者说，“接受者语言中的信息接受者（应能）产生与原语中的接受者基本相同的反应”（Nida and Taber 1969:24）。在理论上，这样一种新的翻译途径，可结束几百年来来的直译意译之争，因为赖以评价翻译的标准将不再仅仅是译文与原文的比较，而是原文与译文同各自的接受者之间的关系的比较；究竟是直译还是意译，已经无关宏旨了（Jin and Nida 1984:91）。Nida 的翻译理论，是对圣经翻译实践的总结。Nida 所做的圣经翻译的目的就是传教，为了传教，他自然要求译文不

仅能令接受者理解，而且还必须能令他们以行动作出反应，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对原文做相当程度的调节，包括文化调节在内。Nida 给翻译下的定义，也只是基于传教的考虑：“翻译就是在目标语言中再造出首先在意义上，其次在风格上与源语信息最贴切而又自然的对等信息”（Nida and Taber 1969:12）。之所以把意义看得比风格重要，是因为“就圣经翻译而言，至关重要的信息是内容”（Nida and Taber 1969:13）。

为了传教而做的圣经翻译，其原则和策略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其它文本的翻译，甚至不能完全适用于为了其他目的而做的圣经翻译，例如供文学欣赏或学术研究之用的圣经翻译（张南峰 2004: 87）。然而，Nida 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圣经翻译的历史最长，涉及最多语言、文化和最多种类的文本，因此，其经验可以用于其它一切方面的翻译（Nida 1964: ix）。

显然，Nida 的翻译理论是对圣经翻译实践的归结，却以普通翻译理论的面目问世，这就是其问题所在。翻译研究有其赖以生存的沃土，而 Nida 翻译研究的沃土就是圣经翻译，也就是说，Nida 的翻译理论是有其地域性的，有其特定的应用领域（圣经翻译），有其固定的生态圈（传教）。而一旦跨出这个特定的生态圈，这个特定的应用领域，其理论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出现完全不适应的情况。Nida 的翻译理论是他在《圣经》翻译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理论，但他却认为其理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这就违背了翻译生态学的原理，违背了“翻译研究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沃土”这一论断，这必然会遭到持解构主义翻译观的根茨和主张以文化为导向的翻译理论家等的批评。再说，根据生态学观点，穷尽一切的翻译理论度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这是保持生态平衡最基本的观点。Snell-Hornby 说得好：“理论家高谈阔论一切的翻译，但说的其实只是某一个范围的翻译，而且往往是个很小的范围”（Snell-Hornby 1995:14）。

黄忠廉曾撰文“经典能守住母语的根”，充分说明了读国学经典，对自己在翻译教学和研究的重作用：

……多年下来，我深感经典是源，能化作涓涓细流；读典有益，且受益无穷，对学外语的人尤其如此，可以抵御欧风美雨。

经典能防译文滞涩。读经典，于我最大的收益是少了翻译腔，无论是英译汉，还是俄译汉，断然不会译出“有了一个灵感”，语感叫我直通“灵机一动”。教翻译课时，言简意赅式点拨或批改，颇能赢得学生的惊美，让他们感受母语的美，如“在可能早的时间里”改作“尽早”，“奇异的鸟类”改作“珍禽”，“你负责种花，我担负一切费用”改作“你种花，我出钱”之类。

经典能守住母语的根。人到中年，经常受熏于经典，有助于母语的养护。你时会感到汉语的灵性，品味汉语的细腻，体悟汉语的高妙。经典能滋润学术之笔，靠的是经典陶冶而成的思维与表达的方式，因而能去欧化，讲谨严，求精炼，有生气，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洗净铅华呈本色。

经典催生了“变译理论”。在比读《论语》、《孙子》等典籍今译本和英俄语译本时，发现古文的阐释性今译，古文的阐释性外译，加例式译写（如本报报道过的瑞士胜雅律将三十六计译写成《智谋》），非常有趣，再结合严复、林纾等国内外这种变通式翻译，于新世纪之交提出了“变译理论”，2002 年出版了《变译理论》，这是受惠于经典润泽的旁证。（黄忠廉 2007）

2. 翻译研究的多元性

世界地理政治的飞速发展，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日益繁荣，相关学科、跨学科，特别是认知科学的迅猛发展，必然对翻译研究产生空前的影响。翻译研究成果“呈现出爆炸性的增长趋势，研究思路变得繁复多样，研究领域迅速扩展”，“研究方法、理论学说、研究目的、名词术语和技巧程序”彼此各异，“令人眼花缭乱”。（廖七一 2001：41）这是对当今世界翻译研究的生动描述。如西方的翻译理论学派层出不穷，主要有文艺学派、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学派、翻译阐释学派、翻译的解构主义学派，美国翻译培训班学派、法国释意理论派等八个派别。它们都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对翻译事实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这一切都促进了译学的繁荣，使其研究范式逐渐转变，研究范围持续扩大，研究视角日趋多元，方法和手段也更加客观、科学。翻译研究的多元化趋势，也证实了“翻译研究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沃土”这一论断，因为各种翻译理论都是以各自赖以生存的翻译事实和现象为立足点，从自己独特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从而使得翻译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正是这些五彩缤纷的翻译研究特色，为世界翻译研究的大发展提供了动力。

然而，目前国内外翻译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主要倾向就是，文化学派及解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对翻译学建设的影响。文艺派、科学派（语言学派）、文化派（翻译研究派）、多元系统派、解构主义派，还有功能派、目的派、女权主义派和操控派等在翻译研究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扩大了翻译研究领域，能较好地解释过去就存在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翻译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译者，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推动了译学的发展。但他们的有些观点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给了译者过大的权利，使翻译有趋于创作的倾向。这就使得翻译的本质属性发生了异化，逐步走向了自我否定。因此，有人提出“翻译学归结论”，对当前最具影响的文化派翻译理论进行深刻反思。他们认为，翻译研究必须“直面翻译学最根本的问题：翻译本体论（即它是什么，它存在的本源，它具有的本质）和认识论（即应用或设计什么方法来研究它）”。（赵彦春 2005：2）“翻译学归结论”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翻译研究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沃土”这一论断。研究植根于泥土，译论发生于事实。翻译研究赖以生存的沃土就是翻译事实，翻译研究应该直接面对其本质问题，而不应走得太远，脱离其本质。

3. 发展中国的翻译理论

那么中国的翻译理论应如何发展呢？对此问题，一直存有争议。一部分人认为，应放弃其地域特色，去追求大一统的世界译学；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构建大一统的世界译学是痴人梦想，中国的路子只能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路子由中国人自己来走。谭载喜（1988）认为，“科学是不分国界的，不分民族的”，翻译作为人类的一项普遍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存在着许多共性的东西，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等口号，有可能使我们的译学研究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泥坑。张南峰（2000）认为，把建立中国翻译学单独提出来，过分地突出了它的地位，夸大了中国翻译学的特性，同时也就忽略了它与翻译学下其它分支间的共性。他们认为西方的翻译理论领先于中国译论（朱纯深，2000；张南峰，2000；谢天振，2001），值得我们学习和见解，提出“把外国理论请进来”，然后是“……走出去，与国际接轨，参与国际交流，共同构建世界翻译学”（张南峰，2000）。但

有的学者不同意他们的提法，认为当今翻译理论研究应立足于本民族的语言和包括文、艺、哲、美等在内的文化现实（刘宓庆，1996；张柏然、姜秋霞，1997；孙致礼，1997），如果脱离语言文化研究的确定性，那么其理论研究也就失去了对策性，因而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的主张。那么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的建设究竟应如何进行呢？是以构建对人类所有翻译活动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翻译学为依归，还是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为目标呢？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有失公允。按照生态学原理，全球生态圈和地域生态圈是相互依存的，全球生态圈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地域生态圈的消失，相反，正是这五彩斑斓的地域生态圈构成了大一统的全球生态圈。中国的翻译研究也不例外。世界翻译学和中国翻译学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翻译学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中国翻译学特色的消失，相反，正是这五彩斑斓的国别翻译学特色构成了大一统的世界翻译学。那么翻译研究只有扎根于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壤，才能保持特色，并使其小翻译研究生态圈得以保留，从而为建设外部大一统而其内部又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全球翻译研究生态圈做出贡献。

王宏印认为，“理想的翻译学作为一门科学理应是普遍适用的，具有终极目标性质的纯理论体系，如同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的形而上学所已经达到的程度。然而，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科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史文学作品及其文艺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上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王宏印 2003：231）。

四、结论

本文根据生态学有关原理，从翻译研究的地域性、翻译研究的多元性和发展中国的翻译研究三个方面对“翻译研究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沃土”这命题进行了论证。任何翻译研究及其成果都是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对翻译事实和现象进行的探索，也就是说，都有其赖以生存的沃土。而且任何一项翻译研究，任何一个翻译理论，都有其生存的生态圈和生态空间，不可能穷尽世间所有的翻译事实和现象。虽然如此，但每一翻译研究成果都向揭开世间翻译的奥秘付出了努力，使我们与翻译真理的距离又接近了一步，从而推进了译学的发展，对世界翻译学做出了贡献。中国的企业翻译研究、翻译变体研究、翻译适应选择论、自由派翻译研究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它们扎根于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壤，不但保持了自己的特色，保留了自己的小翻译研究生态圈，并且为建设外部大一统而其内部又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全球翻译研究生态圈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 Feldman, Yeal S. 1985. Poetics and Politics: Israeli Literary Criticism between East and West.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for Jewish Research*. 9-35.
- Gentzler, E. 1993.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Jin, Di and E. A. Nida. 1984. *On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and English*.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Nida, Eugene A.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Leiden: E. J. Brill.
- Nida, Eugene A. and C. R. Taber. 1969.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Leiden: E. J. Brill.
- Snell-Hornby, Mary. 1995.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Revised Edi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Toury, Gideon.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曹湊贵主编, 2006, 生态学概论,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黄忠廉, 2007, 经典能守住母语的根, 《光明日报》, 2月3日。
- 廖七一, 2001, 当代英国翻译理论,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 刘宓庆, 1996, 论中国翻译理论基本模式, 《中国翻译》第1期
- 孙致礼, 1997, 关于我国翻译理论建设的几点思考, 《中国翻译》第2期
- 谭载喜, 1988, 试论翻译学, 《外国语》第3期
- 王东风, 2000, 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 《中国翻译》第4期
- 王宏印. 2003.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 湖北教育出版社
- 谢天振, 2001, 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 《中国翻译》第4期
- 张柏然、姜秋霞, 1997, 中国翻译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 《中国翻译》第2期
- 张南峰, 2000, 特性与共性----论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的关系, 《中国翻译》第5期
- 张南峰. 2004. 中西译学批评.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赵彦春. 2005. 翻译学归结论.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朱纯深. 2000. 走出误区, 踏进世界, 《中国翻译》第1期

Translation Studies Depends on Its Areal Ecosphere

Xu Jianzh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191)

Abstract

The emergenc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ings in the world depends on thei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hich is the sum total of various conditions in the living space of organism. Since translation is a basic activity of human being, its emergenc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also depends on hum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o is Translation Studies which depends on its areal ecosphere. Hum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a compound system consisting of natural, social and normative environments. Ecology maintains that the global ecosphere and areal ecosphere are interdependent, and it is the colorful areal ecospheres that constitute the united pluralistic global ecosphere. Therefore, only Translation Studies takes root in its soil can it keep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united pluralistic General Translation Studies.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is with no exception.

Key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real ecosphere; translation ecology